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4.001

[主持人语]1999年的《国画》让王跃文获得了“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他写于2007年的《大清相国》,因王岐山的推荐而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他的中篇小说《漫水》荣获鲁迅文学奖;在2014年的全国书博会期间,他又带着一本讲述爱情和家庭的新作《爱历元年》亮相。

不少人认为《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的转型之作,但王跃文始终不认可自己的创作存在转型一说,并指出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日常生活,都贯穿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期望。事实上,王跃文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面对现实他有严厉的审视,也有精微的雕刻,更有切实的人生体验。王跃文把自己的成果归结于写作的踏实,认为过去写机关材料也是认认真真,后来文学创作也是踏踏实实,必须逼出自己的能力极限。其实归根到底,这是一种为人的踏实。与此同时,他对小说艺术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这其中的得失非常值得学界研究。对于新作《爱历元年》,他概述为“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我希望在小说中能多角度呈现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最终对善与美的升华。”客观地说,《爱历元年》延续了王跃文小说的一贯风格,是他对当代生活的执着思考与书写。小说触及各种现实的问题,汇集了诸多的矛盾和升华式解决,王跃文为笔下人物在生活与精神困境、时代与社会变迁中找到了精神的出路,那就是与人为善,回归日常,重返初心。关键是,他对生活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抱有希望,总是试图用拥抱生活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

王跃文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低调的观察者,专门关注那些既是日常化又具有某种普适性的人情冷暖。与其说这部小说看上去像是有关爱情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人性启示录。由于这部小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容量,也呈现出丰富的意蕴和文本的张力,因而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所谓乐山乐水,见仁见智,纯属正常。或许,这才是解读的正道。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王跃文长篇新作《爱历元年》专辑”,特邀三位学者撰文,以期更加深入地挖掘这部转型之作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主持人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杨经建教授)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杨经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关键词]王跃文;《爱历元年》;人性探索;中年危机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4-0001-04

Love Lost will not Return

——Comment on Wang Yuewen's *First Year in Love*

YANG Jing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First Year in Love* is a milestone in the novelist Wang Yuewen's career, in which the two basic literary

收稿日期: 2015-02-12

作者简介: 杨经建(1955-),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思潮。

dimensions “politics” and “sex” are combined into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Hereby, *First Year in Love* is more of a book of human nature than passionate love. The motivation of this novel lies in the “middle age crisis” experienced by the author and the figures in the novel, and the solution is the moral and physical infidelity. In Wang Yuewen's understanding, love is just a way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while marriage is a return of love.

Key words: Wang Yuewen; *First Year in Love*;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middle age crisis

—

王跃文曾说过,他很在乎《爱历元年》这个书名,它既是对小说情节的概括,也是对书中人物的美好祝愿。^[1]所谓“爱历”,是小说男女主人公孙离和喜子为了爱情而定的私人年历。按照作者的说法,两人的婚姻始于“爱历”,期间通过生活的磨砺、感情的坎坷和人生的遭际,一度偏离了“爱历”而另辟“爱途”,后来又回归婚姻正轨且重新开启了“爱历”。从时间概念上来说,始于和重启便是“元年”的涵义。显然,“爱历”的“元年”的这一表述也意味着,王跃文小说创作的言说范畴实现了有意识的转向。

客观地说,王跃文本人很反感“官场小说”作家的称谓,我也和他颇有同感。不过,“官场小说”之谓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爱历元年》之前王跃文小说创作的重心指向。但我更认为,王跃文式“官场小说”其实应该改称为“政治文化生态小说”。须知,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必须建构在一定的价值支配下,这种政治生态建构与政治文化在功能层面和价值层面上有机耦合。虽然“官本位”已无法准确概括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现状,但政治文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敏感、最令人瞩目、最具有导向性的文化形态。一种健全而合理的政治文化必然会超越政治本位主义(“官场”)而延伸、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体系,并以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为旨归。

就此而言,王跃文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既笔指“官场”更不仅限于“官场”。或者说,“官场”充其量是王跃文小说的触发点。其创作是在“政治文化生态”的叙事架构下把握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维度,为当代中国社会以政治文明进一步发展所亟需的价值理性构建提供文化设想和艺术反思。《国画》《苍黄》莫不如此。

在此,我无意铺展对王跃文“政治文化生态小说”的论析,只想联系《爱历元年》来指出,统观王跃文的小说,其主题已展示出“政治”与“性爱”(爱情是性爱的最高和最极端的形式)两个话语言说层面。即,王跃文小说把“政治”和“性爱”这两个敏

感的题材当做进入文学、进入人性的一个门径、一个路口。

实际上,“性爱”作为人类一种最为基本的生存体验贯穿于文明进程中。古希腊人以饮、食、色为人的三大欲望、三种快感;中国人则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说。毋庸置疑,性而上的“灵”与性而下的“肉”是人类性爱得以实现的两种基本形式,而两者之间的对立与两难则显示了人类对把握自我的无能为力,构成了个体性生命的存在悖论。人类总是希望在灵肉一统中把握一个更为真实可感的自我存在。

相对而言,政治和性爱这两者既一样又不一样。政治是一个公开的领域,是一个公众的视角,西方的思想家如叔本华、福柯特别喜欢探讨权力意志、政治权力对人的支配权。换言之,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力量支配另一种力量。在王跃文的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天下熙熙皆为“权”来,天下攘攘皆为“权”往。问题在于,当某个人比如《国画》中的朱怀镜获得世俗成功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一种深层次的灵魂溃败。性爱的问题归结到本质上,也是一种支配力量,这是两性之间互相支配的问题。两者不同的是,政治属于公众领域,道德上涉及“正义”,性爱属于私人领域,道德上涉及“情”。当然两者之间的边界有时候也会模糊。

我在猜测,王跃文兴许已经意识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核心,性爱为人类最隐秘最私人的部分,两者其实是处于生命存在的两极区域,都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层把握。具体到《爱历元年》,王跃文在情爱叙事上非常节制。因为他写的目的是为了呈现人性深层次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觉得探讨性的问题,比探讨政治的问题更容易呈现人性最基本的方面。比如小说的女主人公喜子。她与孙离刚体验到爱情的原味,便因结婚后激情渐退,生活陷入沉闷中。于是她选择了逃避——通过考取研究生而逃离婚姻。喜子毕业后,尽管一家人再次团聚其感觉却已不复当年。在此,两个生活关系最亲密的人互相之间却难以理解和认同。他(她)们身在家中,生活却在别处——各自心中隐藏着“围城”之外美丽的风景,却把枯燥乏味、沉闷单调的一面,

呈献给朝夕相对的人，在人生道路上貌合神离地相随相伴。对看重情感生活的主人公来说，这才是人性最大的悲剧。

《爱历元年》一方面以孙离和喜子分别“爱”入迷途来审察人性，写出了人心的迷蒙和软弱。由此给出的结论是，婚姻的常态就是人生的不完美，而家庭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性自我延展的牢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王跃文试图与读者一起喊、一起痛，一起面对必须面对的人生。“孙离很想告诉喜子，他至今不敢想起一个女人，一想起，他胸口就会钝钝地痛；但他和她的故事早已结束。喜子自己的故事，却永远不想让孙离知道。喜子只想安心地守在孙离身边，变得越来越老，朝着他傻笑。”这是全书的结尾。实际上，对于两个心灵已经千疮百孔、情感已经支离破碎的人，是否能重启“爱历”的“元年”进而续写“爱历”的年谱，这绝对是个问题！但作者本人却相信破镜能重圆。这主要源于一种精神能量，所谓重返初心才是生活的真谛，这就是人性的理解与包容。

如前所述，政治是公共生活的核心，性爱为人类最隐秘最私人的部分，两者其实是处于生命存在的两极区域，都体现着对控制的欲望和对自由的追求。王跃文的小说往往将政治伦理与性爱叙事并举，去探寻人的心灵、心理的奥秘与奥妙，表达他对人性的认识与理解，寄寓他对社会的批判与警示。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跃文何以说《爱历元年》是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其实，王跃文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道主义者。

二

按王跃文的说法，《爱历元年》是他“中年危机”的产物。“自己未进入中年之前，总认为中年危机是个伪命题。一旦进入中年，很多始料未及的困惑、纷扰和迷惘都逼到眼前来了。”^[2]这里所说的“危机”应是心理危机。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危机（psychological crisis）是指个体在遇到了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困难，当事人自己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和应激方式来解决时所出现的心理反应。

显然，王跃文式“中年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危机，“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1]其本质则是中年人自我的迷失，也是个人在自我身份和角色定位上的危机。

无独有偶，著名导演李安也有过类似的“中年

危机”。李安曾说拍《色戒》这部电影的最初动机是感到“中年危机”。电影里前所未有开放的性爱场景似乎就被人认为是李安内心躁动不安的中年情欲。问题并非如此。事实上，在早年的“父亲三部曲”中李安小心翼翼地表现了父与子、父与女之间的磨合、投降甚至背叛，在《卧虎藏龙》中玉蛟龙与李慕白的关系，仍然无法脱离背叛与传承的奇妙纠结。而在自己的父亲去世后，李安拍摄了《色戒》，“父亲”的形象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压抑中爆发的激烈情感。也许，李安用“色”与“戒”关系来说明，色，是人的野心、人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李安借此要把过去积郁全部冲决出来。那是一种倍感疲惫、恐惧和绝望的中年人的激情！你理解成中年危机可以，情色也可以，总之李安终于可以面对内心的想法了。

虽然李安和王跃文对“中年危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可视为一种贵族式心理综合症，草根阶层和底层民众却不会拥有。因为后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地位的保障，缺乏对公共资源的合理的拥有，正如贾府的焦大绝不同于林妹妹，他们所担忧所操虑的仅仅是一种起码的生存欲求。王跃文、李安们的“中年危机”不啻为成功者的一种非破不可又欲破不能的精神临界状态，一种莫名的精神焦虑。王跃文陈述为“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1]用李安的话说是“确实就有这种（中年）危机感。觉得自己人怪怪的，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3]

相对而言，王跃文对“中年危机”的认知更具有某种深刻性和普适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所以，我想用我的笔写写这个时代的病。”^[4]而美国学者卡伦·荷妮则将疑似（精神）症状表述为“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平静的、心态平衡的人不会成为心理失衡的受害者，受害者只能是那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同样，“内心冲突表明引发冲突的人格结构，就好象体温升高表明身体有病，”因此，这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无论表现如何，都可以找到引发“内在冲突”的病态的心理结构。^[5]卡伦·荷妮进而指出，这种病症不只是由于偶然的个人经历产生的，而是由人们所处的特定文化处境所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其症状表现者为了抗拒焦虑建立了不同的防御机制，如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等,同时也把个人形象完美化,如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症状化性格结构。

无独有偶,对于“中年危机”的破局,王跃文和李安在其创作中都是通过感情突围或情爱转移来完成的。如果说,在《色戒》中李安借梁朝伟的手、汤唯的身体释放一种长久的压抑、积郁和激情,那么,在《爱历元年》中,爱情既不是生命的本质也不是人生目标,而是疏解“中年危机”唯一可行的精神秘方。也可说,爱情更多的是一场修行——安顿灵魂的一种方式。

在王跃文的笔下,面临“中年危机”的孙离和喜子曾一度陷入了压抑焦虑、迷惘虚无、孤独无助的精神症候中。有理由认为,孙离和喜子的“出轨”纯粹是逃避现实的动机的合理化机制(一种为自己找借口以减轻焦虑的精神防御机制)。假如他(她)们具有大多数正常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根本不必以“出轨”或“出格”来对待爱情。其最后的无言的结局也证明了这种行为的“荒唐”。颇有《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语,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意味。

当然,我这里说的“出轨”是指道德出轨。实际上,在小说中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两者相存相依:不出轨就不能突围,突围就必然出轨。除了痛(痛苦)不欲生还是痛(痛快)不欲生,你别无选择!也因此,无论是孙离还是喜子,甚至不管是李樵抑或谢湘安,读者看不出他(她)们有什么道德败坏或者感情玩弄的劣迹,反倒留下值得同情、可供联想的审美印象。所以王跃文说:“我写的并不是完美却让我们无比留恋的烟火人生。这是一部无关宏旨的小说,却又是一部温柔动情的小说”。^[2]

无疑,小说中的情爱书写都建立在对生活深广的体察上,作者为此调动了生命诸种的体验与感觉。不难发现,有关情爱的描写使人触摸到人心特别柔软的部分,让人难以忘怀。比如孙离与李樵之间浪漫而不无美好的交往。“对于孙离来说,爱情就是与爱的人做一切美好的事,比如,到芦苇滩去看芦苇;到郊外的小饭馆享受自然野趣;到道观喝茶;在寺庙听琴、画画……所有文人的雅事,都被两个相爱的人尝遍了。正是在与李樵一起做的那些美好的事情中,焦虑感不知不觉被转移了。”^[6]

严格地说,这种以“中年危机”为表征的精神症状,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那里展示为对无法实现的内心完美的焦虑和内疚,极似哈姆莱特式“延宕”。如果说哈姆莱特的“延宕”表现为长久地徘徊于“思虑与行动”之间,那么孙离和喜子的“延宕”则表现为犹豫、彷徨在道德出轨与感情突围之间。不同的是,后者不似前者那样存在着激烈的心灵冲突和痛苦的灵魂拷问。诚如王跃文所云,中国本来缺乏宗教文化背景,人们的内心没有神的看顾,所作所为无须向神交待。于是,道德的严格自律只可能发生在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离并非个精神上的苦修者,他的内心中还具有一种向善的本能欲求:能爱又有所不忍,作者便让他活在一种淡灰色却又向着光明的空气中。^[1]也许,“延宕”之后的孙离和喜子“已经明白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地妥协与和解的过程。与自我和解,与他人和解,与环境和解,与世界和解,与自己眼中 and 心中一切的不完美和缺憾和解。”^[7]这就有了小说最后孙离和喜子重续“爱历”的指望。我以为,这样的指望是作者人为的摊派。皆因,“迷失”后的“回归”得到的只能是婚姻,而无关爱情。毕竟,每一份爱情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日历”,“爱历”之后已无“元年”。

参考文献:

- [1] 王跃文. 愿人间爱历永远[J]. 长篇小说选刊, 2015(1): 4-5.
- [2] 王跃文. 倘若没有文学,活得没有意义——答《羊城晚报》[N]. 羊城晚报, 2015-03-30.
- [3] 王玉山. 独家对话李安:我已经走出中年危机了[EB/OL]. (2012-11-02). [2015-01-09]. <http://ent.sina.com.cn/m/f/2012-11-02/18083778889.shtml>.
- [4] 乐梦融. 作家王跃文:我想用笔写时代的病[N]. 新民晚报, 2014-08-13.
- [5] 卡伦·荷妮.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M]. 陈收,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2.
- [6] 岳雯. 爱情是一场修行[N]. 文学报, 2015-02-11.
- [7] 牛玉秋. 婚姻危机中的男女如何回归[N]. 文学报, 2015-02-11.

责任编辑:黄声波